

重返阵地

□ 梁桐纲

8月3日下午,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微风拂面,清爽怡人,好一个行走游览的好天气。抬头望去,只见太阳在云层中不时地露出笑脸,又羞答答地隐藏起来,好像在引逗着我的思绪,几番萦绕心头的念想再次袭来:趁凉爽,到50年前我们部队的预设阵地去看看。那土路、那山头、那阵地,虽然在我离开部队后,不止一次地登攀上去,回念那事,那人、那难忘的岁月,但每上去一次,就会有一次新的感悟和收获,总会激荡起心中的波澜。

我们一起从石家庄到乌兰察布来避暑的共有3家10口人,其中有老人、有青年、还有孩童,他们愿意与我一同去追寻我们当年留在边疆的岁月印痕吗?我拿起电话,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分别给另外两家的主人打了电话,没想到两家人竟毫无迟疑、出奇一致且斩钉截铁地答复:去!我不禁被他们的回答感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们这一代人心底藏着满满回忆,而对于后代,那是我们想让他们了解的一段历史。于是我们立即行动,开车出发了。

另外两家的主人,一位是基层人民法院退下来的老院长,一位是参加过援老抗美的参战老兵。我们开车走过集宁区平展的柏油马路,从桥东穿过南地道桥来到桥西。今日的桥西,已是今非昔比,挺拔的高楼,宽阔的大街,满目的门脸,让人眼花缭乱。老伴儿唯恐我在众人面前带错了路出丑:“可别不认得路了,让大白跑一趟呀!”“放心吧,尽管城市日新月异,但我们的阵地我已是熟稔于心,错不了。”我开着车回答道。

出城不远便上了山间土路,

腾起尾尘的弯曲小道,没有给大家的热情扫兴,却如油画般吸引着人们的双眼。“这是50年前我们入伍时徒步到部队走过的路,打那时起,我们就与这条道路结缘,一身戎装的戍边战士们在这条道路上,不知洒下多少汗水,留下多少回忆。”我指着周边环境边开车边说。到赵秀沟村不远处,我们的两辆车有序地沿路边停靠。大家下得车来,我指着不远处海拔1500米左右的一架山头对大家说:“前方就是我们的14.5毫米高射机枪对空阵地。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离开了我们,全军进入一级战备。我们全连指战员全副武装,风餐露宿,在阵地上坚守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保卫了祖国安全。”大家静静地听着,就连刚刚7岁的小丫头也睁着大大的眼睛,似懂非懂地在聆听中望着远方。

“走,上去看看。”年逾古稀的参战老兵见到阵地就来了精气神,召唤着大家向山头攀登。山脚不远处,有一道宽宽的壕沟围绕山间,尽管岁月的风霜给壕沟留下了斑驳印记,甚至被蚕食得有些面目全非,但曾经的战士会一眼认出它的真容。“这就是当年步兵战友们挖出的反坦克壕。”我说着。“对!没错,是反坦克壕!”参战老兵应答着。“叔叔,反坦克壕是干什么的呀?”老兵的女儿问道。我站在壕沟边对她说也是对着大家说道:“反坦克壕一般构筑在山头阵地下方,有上口宽6米、下底宽3米、高3米等不同尺度的标准,主要是对付敌坦克对我阵地的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坦克壕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大家听得入神,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做着国防教育的演讲,感到非常荣幸。

“往上冲!”又是参战老兵发话,只见他把手一挥,不顾年迈,

弯曲着身子向上攀去。半山腰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步兵战壕。老兵高兴地喊道:“呀!步兵战壕!”说着便跳进壕沟,顺势来了一个投弹的动作。孩子们惊讶着:“这就是常在电影上见到的战壕呀?”“是呀!当年,保卫边疆的战士们为了祖国安宁,将这里构筑成了能打能防的钢铁长城。”我回应着孩子们的问话。

我们再往山上攀登,一个矗立在半裸露坑道上方的醒目目标映入眼帘,只见五星军徽下写有“军事设施”的字样。那坑道口,就像睁大的警惕的眼睛在注视着远方。见到坑道,就像见到久违的朋友,不禁勾起我遥远的记忆。那年我们驻守山头高射阵地,步兵战友们则携带一个基数火力弹药进驻坑道。我给大家讲道:“进入一级战备第三天的中午,我在山头上亲眼望见,从半山腰坑道口出来的步兵战友,在烈日下双双拧着滴水的棉被,想想战士们是怎样在极端潮湿的环境里坚持防守的。”我接着说道:“这就是我们的戍边战士呀!”没有当过兵的老院长听着我的讲述很是激动,高声说道:“战士伟大!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留个影。”于是,我们的身影定格在了坑道口旁。

其实,我们攀登山头的重头戏在于寻找我们连队当年的高射阵地。于是,老的少的没有停歇,继续向着山巅攀登。我和参战老兵率先登上了山顶,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我们在山头阵地上挖掘的14.5毫米高射机枪掩体,还在那里静静地诉说着往昔。一班的、指挥班的……一个一个掩体都是满满的回忆。参战老兵的部队在南方边疆,我们在北部边疆,南北虽遥远,军人心相连。参战老兵在阵地上心情与我一样的激

动,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情不自禁地比划着战斗的动作,引来孩子们好奇的眼光。

我站在山头,手指着西南方向的一处高地对大家说道:“当年我们一线部队,都是以阵地为家,每个连队守卫着一处阵地,那个山头就是我刚入伍时的12.7毫米高射机枪阵地。”参战老兵听后决心要转战阵地,再攀一个山头去体验一番。我应允着,车行半路,徒步走去。一路步行,一路回忆。1975年春季,刚刚新兵下连的我们,被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哨音从睡梦中惊醒。连长在队前宣布:“上级命令我连迅速占领阵地,随时准备战斗。”我们对连长模拟下达的演习命令没有怀疑。旋即,背着背包的战士们进入实战状态,以班为单位迅速拆解枪体。我扛着重达三四十公斤的枪身向着山头跑去占领阵地,武器加背包水壶等足有100斤重。我们刚从平原到内蒙古高原三个多月,身体还在适应中,负重越野跑步攀山,不一会儿汗水便透过棉衣,心跳比擂鼓还要激烈。临近阵地,战友王建国接过我扛的枪身继续攀登。我跟着奔跑,气喘吁吁,毫不落后。战友们说我的脸都变得一片煞白。站在阵地上方的连长看到我的情况,大喊一声:“不准停步,绕着山头慢跑。”我当时累得真想躺在山上休息一下,听到连长喊话,没有停下脚步,围着阵地缓慢跑着,直到呼吸均匀下来。事后从连长那里我才知道,如果当时我立即停下脚步,心脏供不上血,或许也就在这高原阵地上“光荣”了。

半个世纪了,重返阵地,看山山亲,看草草美!我抚摸着山石,禁不住心头一紧,泪水盈目。这是我们曾经战斗的地方,这是我们保卫的家园。

六月二十的雨

□ 卧龙令

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民间称之为关老爷磨刀日,又称雨节,但农历的六月二十,我发现也是个经常下雨的日子。

六月二十,其实是个普通的日子,不像雨节有那么多传说,然而每年这一天几乎都要下雨,这已经从我的记忆里得到了印证,玄理也好,自然规律也罢,反正这一天真的好下雨!

为什么我对这一天如此念念难忘?因为,这一天是我姥爷的寿辰。

我的姥爷,姓刘,名秋子,号洛收。

是冀中南平原乡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当我出生时,姥爷已经年过花甲,

我作为母亲姐妹三人的孩子中第一个诞生的男孩(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姥爷自然非常高兴。

俺爷儿俩就是上辈子的缘分,他对我宠爱至极。

有一次,我在姥爷家住了几宿,父亲来接我回去,我不愿意走。

父亲就急了,强拽着我要上自行车,我哭得哇哇的。

恰好姥爷从地里回来,一向和蔼可亲的姥爷竟勃然大怒,一把抱住我,“孩子不愿走,就多住一天,干嘛逼孩子!”

姥爷对我的那份疼爱溢于言表。

姥爷给我讲故事时,总是爱说“咱穷人家一定要有志气,人穷志不能短!”

我的脑海里有幅姥爷的历史影像,那是听我母亲的姑姑讲完之后,在我头脑中慢慢勾勒、沉淀出来的……

那年,姥爷刚刚十六岁,大哥、三弟已经结婚,他们提出“以后家里事福不享祸不担”就分家另过了。

六月二十这一天,老天爷又像以往一样,雨丝悄然从铅灰的云里垂落下来……姥爷借着雨水坐在门槛上磨瓦刀。姥爷的奶奶还在床上躺着,姥爷的母亲在屋里补衣裳,针线穿过粗布的声音又轻又细,混在檐滴里几乎听不真切。

“老二,这家……”

奶奶枯瘦的手抖得厉害,捧不稳那只豁了口的粗瓷碗,粥汤洒在炕沿上。“老大老三撂下句话就走了……”姥爷没抬头,瓦刀在磨刀石上划着。“娘,家里有我,塌不了!”字不多,平平吐出,落地生根。

锅灶冰凉,柴禾湿润。

姥爷的四弟以及三个妹妹,还有病弱的奶奶和母亲,这一家子人都指望着他,担子像座山,沉沉压在他肩头。

后来,奶奶、母亲走得安详体面,姥爷的四弟结婚、三个妹妹风光出嫁,自己五个孩子嗷嗷待哺……艰难的日子里,他那宽阔的脊背微微佝偻下去。姥爷泥瓦匠手艺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即便自家日子如此紧张,乡亲邻里但凡有所求,他都会放下锄头前去帮忙。乡间活儿,由鸡窝猪圈到厢房主屋,全村三百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留下过他弯腰砌墙的身影。那身影如一把铁犁,在日头下划开土地,在人心间留下恩义。

姥爷喜欢喝酒,我毕业上班第一个月领了工资二百五十二元,给父母一百元,递到姥爷手上又是一百元。余下的五十二元,我径直抱回来两箱二锅头。酒瓶映着姥爷憨厚的笑,酒香弥漫过岁月,竟成了日后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暖意。

姥爷去世时,全村老少几百人都自发来送行,这在这个小村子是第一次。“洛收叔,一路走好!”“洛收这人不容易,人心眼儿也好,应该再让他多享享福!”乡亲们的每一句肺腑之言,宛然就是姥爷坟前的一座座丰碑。

今天又逢六月二十,雨丝细细地飘着。我仿佛看见姥爷那骨节粗大的手,正举起一杯醇酒,如同举起他辛劳而温厚的一生。雨水滴落下来,渐渐盈满我的眼眶,漫溢而出——这哪里只是天上水,分明是上天敬上的一碗酒。

绿皮火车的时光记忆

□ 郭军红

每天沿着迎宾大道跑步锻炼,行至最西端紧邻京广铁路线时,望着南下北上疾驰的绿皮火车,既有亲近感又有违和感。奔跑的列车,仿佛一下子唤醒我沉睡的记忆,将我的思绪拽回到四十多年前。

我的老家就在京广铁路上的一个四等火车站——承安铺车站边上。从我记事起,天天就是枕着绿皮火车的咣当声以及汽笛的鸣叫声入睡、起床。现如今,尽管这个小火车站早已没有了客运火车的停靠,但它曾经的繁华以及乡亲们出行时的便捷,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

记得第一次坐火车是20世纪70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小学生到位于石家庄市区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缅怀先烈事迹。我们人矮力气小,火车车厢门口台阶很高,带队老师费了一番气力才把我们都领上火车。进到车厢里,虽然拥挤,但乘坐火车的新鲜感让我们都很兴奋。

20世纪80年代末,在石家庄上军校时,每年学

里拿着肩上背着的装木锯、墨斗盒之类的工具包。偶尔有拉着行李箱或夹着公文包的人上车,都成了其他乘客艳羡的对象。

在我的记忆里,那个时候,母亲也算个“生意人”。平时,母亲和几个邻居大叔、大婶,将家里的鸡蛋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在纸箱底部铺上麦秸再将鸡蛋放进去,待装满两大箱后,就用床单从外面紧紧包裹起来,像褡裢一样搭在肩上,背着坐上去北京永定门(现在叫北京南站)的绿皮火车进京售卖。等卖完后,再乘坐绿皮火车返回。那时我们姐弟小,至于母亲去一趟北京挣多少钱没有概念,反正是感觉母亲每次从北京回来总有收获后的喜悦。

20世纪80年代末,在石家庄上军校时,每年学

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过惯了穷日子、苦日子的乡亲们都想着乘坐火车外出讨生活,行李中有塞得鼓鼓囊囊的尼龙编织袋,也有用床单、被罩捆扎成的包袱,还有手

患难与共抗震情

□ 王晓义

唐山大地震迄今已经过去了49年,“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不断前行。我哥作为亲历者,给我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哥当年是开滦矿务局直属仓库的汽车司机。1976年7月28日,地震发生时他与另两名工友正在去邯郸送货的半道上。当天夜间到达邯郸后,他们就听到了唐山地震的消息,于是急速联系卸货后马不停蹄往回返。途中,他们一次又一次被陌生路人的行为所感动。

7月29日上午,他们开了一宿车,在马路边停车休息时,朦胧中,突然被一阵汽车的轰鸣声惊醒。原来是两辆带挂斗的“老

解放”(卡车),停在路边修车。

我哥起身走了过去,见车门上喷着九个大字:山东省济宁运输公司。车厢用绿色苫布盖着,并留有多处通风孔。这车上装的是啥呀?我哥好奇地走到车前一看,原来车上装的全是烙饼,饼还微微有些温度,一位两鬓斑白的司机师傅嘴里嚼着硬馒头就着咸菜。我哥莫名其妙地上前问道:“老师傅,您二位这是去哪?”

那位司机操着山东口音用低沉的语调说:“到唐山救灾去,这不刚烙出的大饼,还烫手呢就装上了汽车。唐山人民遭了大难,我们顾不上休息,就连夜赶过来了。”几句话,使我哥这个唐山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打心眼儿里感激山东父老!要知道,在震后断水断粮的情况下,这两车烙饼不知要能救多少人的命!这可是地地道道的救命饼啊!

不一会儿,车修好了,满载大

饼的卡车便又向唐山方向飞奔而去。我哥他们休息片刻后,觉得清醒了许多,因心里都七上八下的,谁也不肯再多眯一会儿,便一齐上了车,由我哥驾车飞奔返唐!

强烈地震将天津芦台大桥震成两截,我哥他们只好绕行廊坊。一天的紧张行车,哥儿几个真是又饥又渴,可他们心情都非常沉重,仍急着往唐山赶,一分钟也没停过。因是绕道,路况不熟,车到廊坊境内路边一个小厂子时,因出现岔道,只好停车问路。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男同志听说我哥他们是唐山的,一天一夜还没吃饭,二话没说喊来几个人,马上点火烧大锅,为我哥一行人烧水做饭。

那些素不相识的好心人怕我哥他们不吃,一再对我哥说:“淮保耽误不了你们多少时间,我们一分钱也不收你们的!到了唐山说不定你们还得挨饿哩。”听着他

们真诚的话语,看着他们淳朴的面容,我哥实在推托不过,只好“客随主便”了。只一会儿,一大锅热气腾腾的西红柿鸡蛋汤,一大摞烫手的白面烙饼摆在了我哥他们面前。我哥他们狼吞虎咽吃了些后一道谢,便又心急火燎地往回赶。令人遗憾的是,我哥直到今天也不知当时给予他们帮助的是哪个单位,是工人老兄,还是农民老弟。

到达唐山后,我哥他们迅速投入救灾工作。因抗震救灾有功,我哥多次立功受奖,还被提拔为直属仓库副主任。转眼间49年过去了,可那次震后返唐途中的一件件“奇遇”让他仍记忆犹新。他常说,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完全有责任告诉下一代,千万不要忘记全国父老乡亲对唐山的无私支援!

(作者单位:定州市公安局)